深度 铜仁融媒深度报道工作室 原创 作品

新闻+更有态度温度

探秘銮塘书院

特约撰稿 赵幼立

地处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境内的銮塘书院，有史书明确记载建于南宋绍兴年间（1131—1162），长时间被学界认为是贵州最早的书院。但是，资料缺乏，有关銮塘书院的研究成果不多，更缺乏发掘佐证，连“銮塘”还是“鸾塘”都有不同看法。笔者虽然在沿河县土生土长，但得知銮塘书院这个名字，还是在大学读书时，是在老师讲中国文学史课时听到的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去年，在省委宣传部组织的“百名博士进贵州”活动中，随同北大、清华的王铭铭教授等实地考察，我也才又不得不关注此事，并多次前往实地查访，查阅相关资料，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考证。

一、走进历史典籍：关于銮（鸾）塘书院的相关记载

由于贵州独立建省的时间较晚，1413年才成为明王朝的第十三个行省。关于成建制的“贵州省”的资料记载本来就不多，有关书院等文化建设的记载则少之又少。手边的资料，关于銮塘书院的记载，第一个版本，最早的是清康熙《贵州通志》的记载：“銮塘书院，在思南府沿河司。宋绍兴时建。今废，石碑尚存。”（本书卷之十五·贡院书院第十二页）该书由云贵总督范承勋鉴定、贵州巡抚卫既齐总裁、贵州按察使丹达礼等三人监修，成书于康熙三十一年，即公元1692年。思南知府刘谦吉担任本书协修，即思南府有关“銮塘书院”内容，是由刘谦吉提供的。此处共记载贵州书院13所，今铜仁境内有6所：思南的“斗坤书院”“为仁书院”“大中书院”，沿河的“銮塘书院”“竹溪书院”和石阡的“明德书院”。此处记录“竹溪书院”时说，“竹溪书院，在思南府沿河司，尚留遗址、断碑。余无考。”由此是否可以认为对銮塘书院进行过考证？

查比康熙《贵州通志》早的明代弘治《贵州图经新志》、嘉靖《贵州通志》、万历《贵州通志》、万历《黔记》，以及康熙《黔书》没有找到相关记载。

第二，乾隆《贵州通志》记载：“銮塘书院，在思南府沿河司。宋绍兴时建。今废，石碑尚存。”（此书卷之九·书院第十四页。电子档158页上）此书由鄂尔泰等主修，靖道谟、杜诠纂，思南知府孔传堂采辑，成书于乾隆六年，即公元1741年，比“康熙通志”晚49年。该处记录贵州书院14所，今铜仁境内有6所。本书关于銮塘书院的记载与康熙“通志”完全相同。此处不同的是思南的“中和书院”代替了“大中书院”，其他内容，一字不差。说明①乾隆本参考了康熙本；②此时“大中书院”已经改名“中和书院”。

清光绪《续黔书》没有相关记载。

第三，是清道光《思南府续志》第五卷“志官门·书院”：“鸾塘书院，在沿河司，宋绍兴间建，今废。竹溪书院，在沿吉，他还于前一年编修了《思南府志》，距今334年。刘知府记载：銮塘书院，“今废，石碑尚存”，即銮塘书院停办时间，应在1690年以前。

二、撩起神秘面纱：关于鸾塘书院的遗址考察

按民国《沿河县志》的记载，銮塘书院的遗址有两处：一是沙子镇的明星村鸾塘组，即《县志》点校本136页的“县东隘口乡，距城四十里，与官坝隔溪相望。前临绿水，后拥青山，为朱可寨孝廉弟兄读书处。”二是沙子镇的官坝村官坝组，即此书卷十七“古迹志”下，“鸾塘胜院，院址在官坝，前临河畔，即朱可寨孝廉读书处。今房檐倒塌，旧址犹存。”（同前书的270页）此书称“銮塘书院”为“鸾塘胜院”。这与当地的传说有关，“今房檐倒塌”并非事实，即是按当地人的一般说法而记的。其实，一般常识认为“书院”和“胜院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前者为文化教育机构，强调其文化教育功能；后者则与寺院和风景名胜关联，二者一般不会混用的。但在《沿河县志》上，在记录“书院”时，将较早的銮塘书院、竹溪书院，都称作“胜院”，而又另有“竹溪书院”和“鹤鸣书院”。从作者都将其归入“书院”类来看，书院和胜院是类同的。也许，作作者心里，胜院比书院更加神圣，更具有风景优美的特质。在同一本书中，为什么同一个遗址，会有不同的指向呢？一是此问题本就存在争议，二是不同的编者所提供的资料不同。确实如此，鸾塘作为地名，处在自泥河中段的一个转弯处，河西的村民姓黎，河东的村民姓朱。在历史上，二姓曾经为“鱼栈”发生过争执，且打过十年的官司。何为“鱼栈”？就是双方的河界问题。黎家人说，白泥河源头较远，涨水的时间较多。一涨水，河心位置就发生变化，时而河东、河北，时而河西、河南，各自的沙滩，岸边的树木及耕地都发生变化，谁吃亏都不好说。朱家人说，有年涨水，他们安鱼的大树桩和碾房水渠都到了主河道以西、以南，成了黎家的了，就为这事打官司。关于銮（鸾）塘书院，各自认为是在己方。

同时，在《沿河县志》上关于“鸾塘胜院”的记载有两处，其遗址所在地也各说不一。在该书卷十的“学校志”章，编辑人是张定中，他认为“鸾塘胜院”在河西；《沿河县志》卷十一的“古迹志”章，编辑人是刘其贤，他则认为“鸾塘胜院”在河东。河西是明星村，河东是官坝村。八十年前就有争议，现今仍然是各说各话。

我们到鸾塘组，车行方向的左边是五龙山，来势较远，逐步抬升，十来里路的远处高峰，落差七八百米。坡脚住着黎家，半坡还住着田家、张家。右手边，就是白泥河，河边有卵石滩，水线以上有十分粗大的枫树古树，树干胸径可达一米。不只一棵，四五棵依岸而排，六七米高，中空，部长。愿以其地内附，遂建思州，以佑恭为首。其后，子孙皆世其官。”（明嘉靖《思南府志》早于万历《贵州通志》，更早于《黔记》。此《思南府志》还录了于观撰写的“宋敏赠少师思国公田祐恭墓志铭”。田祐恭生于1074年，去世于1154年，享年80岁。于观同田祐恭是同时代人，时官衔为“朝请郎知重庆府行夔州路提刑提举事勃州别驾”，他应田祐恭后人之请于1156年写的墓志铭，其真实性不容置疑。《铭》序中说，田祐恭的上三辈都是有功之人，其父田定堪获赠“武略郎”。田祐恭正式出山是1112年，之前就代父出征，有平定靖州之功。在绍兴（1131年）之前就已被封为“武功大夫”“右武大夫”。于观在其墓志铭中有政和“八年（1118年）救石泉军至白沙寨，战退戎兵，以功迁武节大夫。凯还，被召赴阙，迁武德大夫”。“重和元年（1118年），建筑思州有劳，迁武功大夫。宣和元年（1119）授沂州兵马钤辖，再承诏朝参，加忠州团练使，赐金、带、器、币等物，宠赍优隆。”根据这段记载，田祐恭两次入朝，获得皇帝的接见。所谓“不同远类”，应为第一次入朝，即政和八年（1118年）当年十一月十七，改年号“重和”）。《铭》序中言：“初，公之生——及长，禀赋殊特，才气过人，行已纯朴，发言简当，处众以宽，待下以仁，事君以忠义，治郡以公勤，廉谨律身，机变临事，不学而动合古人之作。公用兵既久，厅功浸多，朋交问所能，答曰：吾豢不读兵书，夫复所能，但于戎马间。”这段话，用这样的标示，一般就解释为田祐恭的能力是天生的，是神助。如果，将“合古人之作”和“所能”“戎马间”后面的标点符号改为“？”，这意思就完全不同了。从对其门客夏大均的态度来看，可见田祐恭是一位心胸豁达、喜好学习、不耻下问的“将军”“领导”。在皇帝面前，就敢公开承认自己原本不知礼仪，而是请门客教的。他这实诚，也为夏大均求得了功名。这肯定会激发他、鼓励他对学习的重要性的认识。一人得益，何不让夏大均设馆，让更多的人，特别是让他的子孙们受益？在于观写的“墓志序”中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会羁寨傍扉，置酒言欢，即席言曰：‘吾与诸君皆以武夫进身。比肩少久，吾当以髦辞聪。诸君方壮年，各宜协心捍卫边徼，不能有二，勉之哉。及疾，召子孙立于前，诫曰：吾自入仕仅五十年，历事三朝，治都九域，建功立业，始终如一。今爵高禄厚，无愧无诈。尔等子孙，当孝祖考，勤修乃职，帷忠、惟孝、惟仁、惟义、惟慈、惟养，谨守边方，安集居民，匪懈匪怠，勿违，吾其阴相尔也！”田祐恭在给僚属交待时，要他们认识自己是以武弁进身，要他们团结，齐心协力。捍卫边疆的安宁，尤其是要忠君，不能有二心。在给自己子孙的遗言中，就将忠义归结为“六惟”，以忠孝为先，次以仁义，再讲“慈”和“养”。这“六惟”，也差不多是儒家核心思想文化的基本。他不学习，能有这么高的鸿猷吗？他难道就没有将儿孙们培养成有用之材，以继承自己勋业的想法吗？答案肯定是“有”。以“乃祖堂下永东梵宇，”“夷棚种族……终莫能折服其心”，“唯示公之文押——遂不敢动。”“公之为人，生为夷民信服，死为夷民钦畏，可谓安边之良将也”。这用于述信的传说，实则是田祐恭的影响，也许更有他重视培养继承人的影响。尤其是在政和、绍兴年间，他多次获得赐封：中亮大夫、正侍大夫（1131年），华州观察使（1132年），通侍大夫、知思州军州事（1133年），边都承宣使、奉宁军承宣使（1141年）等。田祐恭去世后，又相继获赠封“保康军承宣使、少师思国公”。即是说，田祐恭深得“忠孝仁义”之益，他哪有不传承弘大的？特别是夏大均获得功名，显然再作“门客”已经不合时宜了，让其独立“门户”，这也是田祐恭善待下属的正确选择。

另据李克相等考证，唐及北宋时，思州治所在现今沿河的黑獭堡及沿河县城东岸，南宋时迁至今务川都儒。田祐恭迁址的原因，主要是金人侵犯黑洋（信陨西省汉中市洋县境内），田祐恭奉四川宣抚处置使张浚之命前往抵御。因田祐恭名声太大，金军望风而逃。田祐恭在返回途中还曾在旱前蛙扎过得川钓鱼台逗留。那时，像田祐恭这样的人物，无论是就职还是征战，其家眷始终随行。所谓迁治所于都儒，也是因为他行军返回时，到达都儒，母亲过世，他就在此停留，且因“母忧解官”（绍兴八年即1138年）。宋时，京都开封和南京，都相当繁华。而地方治所，则不像京都，也不会像现今，会集中许多人口和建筑。官长在哪里，哪里就有人口聚集，就会修建住所建筑。田祐恭于绍兴二十年（1154年）去世，也就安葬在了都儒（今务川归义乡的西山）。于观在“墓志铭”中，还明确为“附祖茔也”。根据以上分析，田祐恭创建“銮塘书院”的可能性不大。

关于尹珍，其为贵州教育的始祖，是汉代之人。郭子章《黔记》将其列入“乡贤列传”之首。“尹珍，字道真，牂牁郡毋敌县人也。珍自以生于荒裔，不知礼义，未渐摩序。乃从汝南许慎受《五经》；应奉受经书、图、纬，通三才。学成还乡里教授，于是南域始有学焉。汉桓帝时，尹珍以经术选用，历尚书丞郎，荆州刺史。而应奉为司隶校尉，师生并显。”尹珍与銮塘书院毫不相干。

南宋时，办书院是一种时髦。如果，到了南宋后期还不可遏制的。銮塘书院的创建人，于观是有这个背景和能力的。但是，他作为“朝请郎”“知重庆府”“行夔州路提刑提举”“事勃州别驾”，他要建书院，只会在其夔州（黔州）治所彭水，而绝不会选择在銮塘这个较为偏僻的地方。最有可能之人，只有夏大均。

关于夏大均的记载，最早的，是明嘉靖《思南府志》。前面提到过，此书关于宋时的人物，只提到三个人，夏大均排在第一。其载，田祐恭从朝拜觐徽宗皇帝，各种礼仪很到位。徽宗深感诧异，祐恭陈说是他的门客夏大均教的，于是，“上悦，厚赐之。拜大均‘保州文学’”。在这里，“拜大均保州文学”，可以是皇帝的行为，也可以是田祐恭的行为。如果是前者，夏大均有了功名，自己出来兴办书院，名正言顺，理所当然。但皇帝对下，一般不会用“拜”，充其量用“赐”。如果说直视文化人，这倒是有利条件。如果是后人加的“拜”字，也不是说得通。田祐恭受到皇帝的嘉奖，封赠，他回到偏远的銮荒之地，不仅一言九鼎，也有“皇恩浩荡”的感觉。无论是哪种情况，夏大均都算是有了“功名”，他就该不再当门客，而要做点自己的事。做什么？跟个风，像其他文人一样，办书院以课子弟，研究、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，是最“与时俱进”的行为选择。这个想法，也会得到田祐恭的支持。他有五个儿子，正好叫夏大均带在一边教教。夏大均要毕业，他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期活在田祐恭的阴影里。

办书院，首先是选址。选鸾塘这地方，还真有其理由。

一是此处是思州通往西阳的交通要道。据史料记载，唐开皇十九年（公元599年），在现今的西阳县万木乡柜木村（即沿河黑獭堡附近）设务川县；唐开德四年（621年）务川改为务州。后改为思州。政和间，西阳的冉万花等起事，田祐恭领命去弹压，就应是从此思州出发的。西阳长期属于四川宣抚司或夔州（重庆）管辖。那时，西阳的冉氏、安氏的势力十分强大。西阳县城的可叫西阳司，是白泥河（古时叫“河由江”）的上游，其水在小河镇与从甘龙发源，经南腰界、官清的甘龙河汇合，经鸾塘进乌江达长江。思州去西阳，河由江上的鸾塘就是必经之道。据当地村民传说，鸾塘有上通西阳、下通黑獭堡的官道。下通乌江等十公里，上接小河只四五公里。在銮家后山还有一集市——大兴场，明清时期很兴盛，直到民初都还十分热闹。在銮家与大兴之间，住着大姓田家。经查看銮上的几座古坟，他们祖先搬来此地的时间大约在明万历年间。这也可间接证明，銮家搬来的时间比河对岸的朱家要早。銮家、田家，他们主要是往小河赶集，不少人家还在小河买有商品房。从鸾塘经河由江到乌江，现在不能通船，但并不代表古时不通船。虽说在其鸾塘下不远处，有一个两三米高的陡滩，但其他地方水都较为平缓。古时的江水比现在的江水要大。行船分两段走，在断航滩处搬运一下货物就把问题解决了。乌江上有很多断航滩，它照样是重要的物资通道。实地考察，在那个断崖处，岸边现在没有人家，但岸边有一些土台。曾经为搬运物资，有人在此住居。如果，从乌江有船经河由江到鸾塘起岸，在这里办书院，就好理解了。

二是鸾塘的地理位置好。白泥河，古时称河由江。在明嘉靖《思南府志》的“山川·江”栏里，在本府下，只记了“乌江”和“德江”，此实为一水。在“沿河”下，只记了“鹅溪、石马、河由”三水。在“河由”下载，“在司治北十一里，源出铜仁府乌罗长官司”。查地图，河由江之水，在小河分两源，一出白江之木黄，经松桃之永安、甘龙、瓦溪，在西阳的天台含南龙、南腰界之水，经蚂蟥乡，官清乡到小河。此水流长在70千米以上。一出西阳的花园，经红井、铜鼓，在小岗台来自岭口、宜居、铜西及县城来水往小河。此河又称西阳河，全长66千米。

所以，小河又称“双河”。在小河下流约十里，在鸾塘这个地方，形成一个“S”形。山的部分，东面来山是龙头岩的余脉，在大漆山碰伸出一支，形成较为薄、陡的“官山盖”。西面来山，则是白泥河（古时叫“河由江”）的上游，其水在小河镇与从甘龙发源，经南腰界、官清的甘龙河汇合，经鸾塘进乌江达长江。思州去西阳，河由江上的鸾塘就是必经之道。据当地村民传说，鸾塘有上通西阳、下通黑獭堡的官道。下通乌江等十公里，上接小河只四五公里。在銮家后山还有一集市——大兴场，明清时期很兴盛，直到民初都还十分热闹。在銮家与大兴之间，住着大姓田家。经查看銮上的几座古坟，他们祖先搬来此地的时间大约在明万历年间。这也可间接证明，銮家搬来的时间比河对岸的朱家要早。銮家、田家，他们主要是往小河赶集，不少人家还在小河买有商品房。从鸾塘经河由江到乌江，现在不能通船，但并不代表古时不通船。虽说在其鸾塘下不远处，有一个两三米高的陡滩，但其他地方水都较为平缓。古时的江水比现在的江水要大。行船分两段走，在断航滩处搬运一下货物就把问题解决了。乌江上有很多断航滩，它照样是重要的物资通道。实地考察，

銮塘书院遗址俯瞰。张跃 摄

在那个断崖处，岸边现在没有人家，但岸边有一些土台。曾经为搬运物资，有人在此住居。如果，从乌江有船经河由江到鸾塘起岸，在这里办书院，就好理解了。

二是鸾塘的地理位置好。白泥河，古时称河由江。在明嘉靖《思南府志》的“山川·江”栏里，在本府下，只记了“乌江”和“德江”，此实为一水。在“沿河”下，只记了“鹅溪、石马、河由”三水。在“河由”下载，“在司治北十一里，源出铜仁府乌罗长官司”。查地图，河由江之水，在小河分两源，一出白江之木黄，经松桃之永安、甘龙、瓦溪，在西阳的天台含南龙、南腰界之水，经蚂蟥乡，官清乡到小河。此水流长在70千米以上。一出西阳的花园，经红井、铜鼓，在小岗台来自岭口、宜居、铜西及县城来水往小河。此河又称西阳河，全长66千米。

所以，小河又称“双河”。在小河下流约十里，在鸾塘这个地方，形成一个“S”形。山的部分，东面来山是龙头岩的余脉，在大漆山碰伸出一支，形成较为薄、陡的“官山盖”。西面来山，则是白泥河（古时叫“河由江”）的上游，其水在小河镇与从甘龙发源，经南腰界、官清的甘龙河汇合，经鸾塘进乌江达长江。思州去西阳，河由江上的鸾塘就是必经之道。据当地村民传说，鸾塘有上通西阳、下通黑獭堡的官道。下通乌江等十公里，上接小河只四五公里。在銮家后山还有一集市——大兴场，明清时期很兴盛，直到民初都还十分热闹。在銮家与大兴之间，住着大姓田家。经查看銮上的几座古坟，他们祖先搬来此地的时间大约在明万历年间。这也可间接证明，銮家搬来的时间比河对岸的朱家要早。銮家、田家，他们主要是往小河赶集，不少人家还在小河买有商品房。从鸾塘经河由江到乌江，现在不能通船，但并不代表古时不通船。虽说在其鸾塘下不远处，有一个两三米高的陡滩，但其他地方水都较为平缓。古时的江水比现在的江水要大。行船分两段走，在断航滩处搬运一下货物就把问题解决了。乌江上有很多断航滩，它照样是重要的物资通道。实地考察，

里。如宋朝在务川，元初在祐溪，后又搬迁到德江的龙泉坪。元朝末年，又在龙泉坪和都坪之间搬来搬去。特别是宋、元的改朝换代，蒙古人进入中原，对儒家文化的传播是一场灾难。《贵州通史》是这样记载的：“自蒙古军进入四川、云南以后，贵州成为蒙古军与宋朝对峙的地带，一方面不断受到蒙军的威胁和骚扰，另一方面宋朝又积极在贵州设防以阻蒙军，时常处于备战状态。元统一天下后，贵州为湖广、四川、云南三大行省的毗连之地，三省经常在贵州用兵，互有争夺，而且遇有重大兵事，三省往往同时出兵，军事活动极其频繁。”（《贵州通史》第一卷第六篇第一章第二节“元军进入贵州”，此书435页。《贵州通史》编委会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北京）可以肯定，在元代，銮塘书院的日子不好过，停停办办是常有的事。再就是战乱，在宋末，南宋皇帝都被元军俘走了，何况百姓！征战年年有，谁还能安下心来读书？

銮塘书院的成就和影响，没有记载但并不能就不存在。一是为田氏执掌边徼培养了人才。比如，田祐恭去世后由田汝端接任，并无他的五个儿子争斗的记载，一直传到田景贤。田景贤见南宋大势已去，故又降元，减少了战争对民生的影响。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，“顺势”的儒家道理，在田景贤那里得到很好的践行。此不能说与书院教育不无关系。

二是开贵州书院的先河。如竹溪书院的创立，虽无宋朝的具体年代，想来应与张恢的儿子张焕有关。张恢曾任夔州路马步兵马府武功大夫，是宋朝的进士。他的儿子张焕，则是首任祐溪司的正长官。张焕见有銮塘书院，则自己就创办“竹溪书院”，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。沿河那么偏远，宋代就有两个书院，可见当时书院受到重视的程度。沿河竹溪书院，就在县城下游的麻竹溪。由于有张氏土司官的背景，竹溪书院一直没有停办，直到民国战乱。据说其遗址一直存在到上世纪中叶，人民公社的大食堂还用过此房。在它百米之外的张家层楼，现今石门、石墙、石阶阳、石院坝、大木房、雕花窗保存尚好（有人将此处误为“竹溪书院”）。据资料记载，沿河县的书院，除銮塘书院、竹溪书院外，还有鹤鸣书院、培宗书屋，其都是清代创建。据民国《沿河县志》记载，沿河人在清以前考得功名的进士6人，举人28人，副榜6人，贡生62人（其中恩贡生11人，拔贡生15人，岁贡生36人）。特别是清康熙“銮塘书院”停办之前，考上进士3人，举人13人。不能不说这些人才的呈出，都是书院培养的结果，但也不能排除其銮塘书院直接、间接的影响。

三是从明代培育了可用之人。銮塘书院早在清康熙庚午年（1690年）以前就停办了，书院之风并没有停息。朱家的五个儿子“皆有功名”，这都离不开鸾塘书院的贡献。朱可寨、朱可顺毕业于銮塘书院，一个是举人，一个是贡生。朱可寨还获大挑第一，进而四川推选知县，他是銮塘书院的优秀毕业生。朱可顺是岁贡生，是挑选至京城贡院读书的学子。据有关资料介绍，清代贵州的岁贡，每年挑选的岁贡生，全省共不多，多则七八人，少则三四人。岁贡生虽然还要回省参加乡试才能进入举人行列，考上举人，才有机会进入“官场”，但已能进贡院读书，已经是当时学子之骄子了，他们有资格与王公大人交往，也还有机会受到太子的接见，或可以以“恩进士”的名义在家乡立碑竖旗杆。其他三个儿子：可大、可曾、可绪也有功名，想必也是“銮塘书院”培养（影响）的结果。另外，朱应商的三个女婿是不是在銮塘书院读过书，无从查实，但要肯定，有好女儿才能找到好女婿。按朱应商的特殊经历和开放思想，想必其三个女儿，也在銮塘书院受过熏陶。“官坝”“官山盖”这些地名都少不了“銮塘书院”的影子。

研究发现，銮塘书院的成就和影响，一是开启了中原儒家思想在思州地区的传播，使属沿河司、务川县的田祐恭的子孙，在明朝的进士、贵州地区的举人中原，文风兴盛。二是开启了贵州书院的先河。如竹溪书院，在宋代就有了存在。一是为田氏执掌边徼培养了人才。比如，田祐恭去世后由田汝端接任，并无他的五个儿子争斗的记载，一直传到田景贤。田景贤见南宋大势已去，故又降元，减少了战争对民生的影响。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，“顺势”的儒家道理，在田景贤那里得到很好的践行。此不能说与书院教育不无关系。

二是开贵州书院的先河。如竹溪书院的创立，虽无宋朝的具体年代，想来应与张恢的儿子张焕有关。张恢曾任夔州路马步兵马府武功大夫，是宋朝的进士。他的儿子张焕，则是首任祐溪司的正长官。张焕见有銮塘书院，则自己就创办“竹溪书院”，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。沿河那么偏远，宋代就有两个书院，可见当时书院受到重视的程度。沿河竹溪书院，就在县城下游的麻竹溪。由于有张氏土司官的背景，竹溪书院一直没有停办，直到民国战乱。据说其遗址一直存在到上世纪中叶，人民公社的大食堂还用过此房。在它百米之外的张家层楼，现今石门、石墙、石阶阳、石院坝、大木房、雕花窗保存尚好（有人将此处误为“竹溪书院”）。据资料记载，沿河县的书院，除銮塘书院、竹溪书院外，还有鹤鸣书院、培宗书屋，其都是清代创建。据民国《沿河县志》记载，沿河人在清以前考得功名的进士6人，举人28人，副榜6人，贡生62人（其中恩贡生11人，拔贡生15人，岁贡生36人）。特别是清康熙“銮塘书院”停办之前，考上进士3人，举人13人。不能不说这些人才的呈出，都是书院培养的结果，但也不能排除其銮塘书院直接、间接的影响。

三是规范了思州田氏土司的统治管理。要承认，中原王朝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相当完备，各种规范的系统性和有效性经过了实践的检验。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不仅是思想的开化，更是制度的建立和完善。在书院受到系统学习教育，管理认知和管理水平都会有明显的提高。田祐恭能用“六惟”来规谏子弟，这里少不了夏大均的功劳。思州土著首领田景贤于1277年以地降元，思州土官田仁智、田仁厚于1365年先后段窜朱元璋，都是传统思想中“顺应时代发展”的很好例证。思州田氏数百年统治不衰，銮塘书院的创办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銮塘书院经朱、元、明、清四个朝代，办学约550年，于清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年）以前停办，并非清雍正（1732—1735）年间。銮塘书院的遗址，几乎全部是在现今的明星村鸾塘组；以“鸾塘书院”之名办学的时间极短；“銮塘书院”在官坝办学的时间也极短。

銮塘书院创办期间，教授、学生都没有史书记载，更别说有多少藏书、有多少出版物及学术成就了。只是到了清代，才说孝廉朱可寨兄弟是从这里毕业的。这500多年为什么就没有任何资料了呢？原因很多，比如思州治所的搬迁。宋时，思州治所就迁到都儒去了。治所在哪里，它毕竟是政治中心，也肯定是文化中心。在宋代，关于中国南方地方政权，有句俗语：“思播田杨，两广岑黄”。思州的田氏、播州的杨氏，在当时影响很大。可在遵义播州出土了不少文物，而思州呢，至今没有出土一件像样的文物。何也？就是因为思州政府经常搬家，一会在这里，一会在那